

近年大陸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趨勢

一以明清時期的研究為例

馮爾康

南開大學歷史學院

這裏說的「社會史」，或稱作「新社會史」，與臺灣學者的「新史學」涵義基本相同。鑒於個人所知極其有限，僅就知道的一點點情況，加上個人的點滴研究，作一些姑妄言之的紹述，敬請在座各位老師和同學的指教。

一、學者關心的課題

南開大學有位博士生郭玉峰對見著報刊的 2001 年中國社會史論文進行了不完全的統計，計有 767 篇，其中：社會史理論 26 篇，社會結構 20，社會群體、社會組織 23，社會階層 20，宗族 49，婚姻家庭 127，生育 17，信仰 100，節日娛樂風俗 93，社會心態、社會心理 48，社會生活 71，社會問題、災害與救助 34，婦女 53，人口與遷徙 71，其他 15。（見《中國社會史研究通訊》第 5 期）

不難看出社會生活史（包括統計中的婚姻家庭、節日娛樂風俗、社會生活）論文最多；社會文化意識（含信仰、心態、心理）的研究蒸蒸日上，居其次；社會結構、組織、群體也不少；人口社會史研究保留一定地位；生態環境史、身體史研究尚未有強勁的開展，但產生了，就是可喜現象。自從 80 年代中期開展社會史研究以來，生活史首先引起學者的關注，這種態勢沒有變化，而文化史與社會史結合成爲新趨勢，文化社會史研究吸引著更多的學者。呂芳上教授說當前臺灣史學界具有研究文化史、臺灣史的特點，在文化史研究熱這一點上兩岸相同。爲說明研究趨勢，再看幾種專題史研究。

二、幾項專題史研究

（一）家族史研究

總的情形是走出過往的家族族權是政權附庸的定位及定性研究，而向全方面開展，特別是宗族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功能的研討。

甲、研究家族活動及族譜的社會功能，互助、救濟的作用，家族文化活動，如陳支平《近 500 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》，江慶柏的江南望族文化研究。

乙、聯宗作為家族史的重要問題被提出來，錢杭《血緣與地緣之間——中國歷史上的聯宗與聯宗組織》（2001），講到同姓聯宗、通譜、異姓聯宗、聯宗世系學，在宗親會大量出現的當今，頗有時代感。

丙、李文治的研究，指出嘉靖時期放寬民間祭祖世代及宗族政治性質加強見解，部分被學者接受。

常建華《宗族志》（1998），宗族史、譜牒史的帶有資料性的研究專著，特別是對元明兩代宗族史研究。關於明代祠廟祭祖，認為遵守朱熹《家禮》，補充李文治之說，宗祠普及。

丁、望族研究，吳仁安的上​​海望族研究、望族文化研究；此類甚多，似乎有叢書，內含義寧陳氏、浙江俞氏（俞樾、俞平伯）。

戊、將家族史納入地方史的歷史人類學的研究，陳春聲、劉志偉、鄭振滿等人的華南歷史人類學的研究，被學者認為是歷史人類學的“工作坊”。

己、新發現的以村落為基礎的家族研究，如周鑾書主編《千古一村——流村歷史文化的考察》（1997），江西樂安董氏家族史。

庚、現代家族史頗有研究者，錢杭等人在江西田野調查，寫出《傳統與轉型：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——一項社會人類學的研究》（1995）。

王滬寧《當代村落家族文化——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》（1991），頗具資料性。

個人對當代家族史有興趣，成稿《十八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》（2001年），認為家族隨著社會變化在演變，朝著民主化家族和宗親會式的俱樂部兩個方向演進。

壬、人類學家對福建閩江下游家族史的跟蹤調查：

林耀華《金翼：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》（1989）；

林耀華《義序的宗族研究》（2000）；

莊孔韶《銀翅：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》（2000）；

黃樹民《林村的故事——1949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》（2002）。

癸、姓氏文化與家族文化研究的結合

姓氏文化研究熱，叢書好幾套，有李學勤主編的《中華姓氏譜》，天津出版的《百家姓書系》，均以一個個姓氏成書。多為大眾化讀物，研究性有待提升。

（二）人口史研究

人口史的研究 80 年代著重於人口數字的瞭解（包括利用家譜資料，在劉翠溶開創的基礎上，吳建華亦進行嘗試），90 年代關注人口行為，生育與婚姻，郭松義、王躍生的研究，均利用檔案史料，扎實，見功力。王躍生〈18 世紀中國婚姻論財中的買賣性質及其對婚姻的作用〉，因論財，初婚價格還少一些，再婚很高，婚姻又是女方市場，造成許多男子婚配困難，這在客觀上起到消極的人口抑制作用。曹樹基〈清代北方城市人

口研究），從城市人口增長與區域人口增長的比率看城市發展水平，認為北方城市發展水平低。

（三）士人研究

士人研究沒有間斷，尤其是對紳士史的清理，張仲禮的專著之後，相繼問世的有王先明等人的著作。新的研究注重下層士人及其出路，如劉曉東〈科舉危機與晚明士人社會的分化〉，認為解額日廣，出仕艱難，不得不棄儒經商，或賣文為生，致使通俗的市井文學流行，出現市民文人（實際是雅俗共賞）。〈晚明士人生計與士風〉，亦雲士人生計窘迫，於是尚利汙行，士節淪喪。趙軼峰〈山人與晚明社會〉，謂不少士人出家為道士，這是脫離傳統儒家道路的一種傾向，引發飄逸閒適文風的出現。

（四）商人研究

泛論商人社會地位、商業經營、商業道德之外，集中在徽商、晉商、海商（閩粵沿海商人）的研究，而徽商研究尤多，這同徽學的興起是一致的。研究徽商與家族的互動關係；徽商婦女的勤於持家與貞節；賈而好儒，子弟讀書出仕，聯絡文人，發展文化事業；報效官府及得到支援；徽商心態，在傳統的自卑感壓迫下，提出人生事業以業商為第一位，業儒為第二位的價值觀。個人作《明清時期揚州的徽商及其後裔述略》，論徽商與地方社會的關係，取利後回報社會，協助政府開展社會公共事務、公益和社會福利事業，建設書院，培養大量人才，如經學家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，促使揚州學派、「揚州八怪」的出現，建設善堂——普濟堂、育嬰堂、藥局、救生船、義渡、義塚、義倉，修河築路、救火等市政建設，種種義舉，融入當地社會。徽學的主要研究者有葉顯恩、周紹泉、張海鵬、唐力行、樂成顯等人。

（五）婦女史、性別史研究

80年代以來開展的研究，從婦女被壓迫史、解放史，進到兩性關係史的研就。拙作〈清代的婚姻制度與婦女的社會地位述論〉（1986），論及包辦婚姻、婚齡與童養媳、旌表貞節與寡婦再婚、溺女與育嬰堂、婦女家庭女僕與生產勞動六個問題，除同性戀外，幾乎涉及到後來學術界討論的所有問題。此外寫過袁氏三妹的〈袁機評傳〉及〈袁抒〉、〈袁棠〉小傳，〈古代著名淪落女子為何受褒揚〉、〈清代節烈女子的精神世界〉。

研究清代女性婚姻的著作多，有郭松義的《倫理與生活——清代的婚姻生活》（2000），定宜莊的《滿族婦女的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》（1999）及王躍生的著作。

同性戀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。吳存存《明清社會性愛風氣》（2000），她還有論文多篇，論述同性戀流行在社會上層和士人中，因為成為風氣，並不遮掩，他們的物件是變童、門子、小唱，產生同性戀文學。張在舟《曖昧的歷程——中國古代同性戀史》（2001），說明同性戀演變過程，魏晉南北朝時期浮蕩，明清淫靡，並對優伶同性戀、教徒同性戀、福建地區同性戀、女性同性戀作專題研究。

（六）民間社會研究

研究民間組織及其活動，群體意識，與民俗學結合，特別是在廟會史研究方面，新著疊出。小田著《在神聖與凡俗之間——江南廟會論考》（2002），通論廟會的組織、活動內容、人們的觀念與娛樂、社會功能（包括今日之活動與功能），利用“主位觀”理解參與廟會活動的民衆歡樂心情，所謂“軋神仙”，人們爲求歡樂，不守禮法和習俗，互相擠撞，對女人無禮，而女子因爲廟會，正正當當到人煙稠密的公共場所遊玩，成了自身的特殊節日，不在乎男子的無禮行爲。廟會允許女性參與，是小傳統，廟會中的婦女，絕不是那樣刻板的，大傳統話語下的女性沒有真實反映女子的全面生活狀態。廟會活動是神聖的，又是凡俗的。趙世瑜著《狂歡與日常——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》（2002），論及民衆生活與大眾文化，廟會成爲全民狂歡時節，與日常生活形成人們正常的日活節奏。還有跟蹤顧頡剛北京妙峰山廟會（妙峰山廟會是華北地區大廟會，今日又在恢復，顧頡剛等人的北京大學民俗學會於 20 年代進行田野調查）調查的，作出博士論文。此外趙世瑜《太陽生日：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》（1999），〈黑山會的故事：明清宦官政治與民間社會〉（2000），是不同時代的歷史記憶、區域性民族記憶的研究，是史學與民俗學的結合。

（七）城市史研究

城市史研究的一種渠道，是從商會史研究發生的，如天津、蘇州商會研究。天津社科院出版《城市史研究》至 2001 年有 28 輯，設有城市空間專欄；蘇州老照片《老蘇州·百年歷程》（2000）、《老蘇州·百年舊影》（1999）。

城市空間與屬性研究，劉鳳雲著《明清城市空間的文化探析》（2001），論傳統城市的屬性、特徵及空間模式，具體介紹城牆、坊巷與社區、官衙與民居、市廛與寺觀、公共場所的劇院、茶館與會館、私家園林。劉鳳雲撰文論明清城市的坊巷與社區，認爲坊制不存在，而形成不同等級村村的住宅區出現人文差異。又著文比較中日都市文化的差異。論明清地方官衙及城市空間文化。還與周允基合作論清代房屋建築的防火。

馮賢亮研究 16 世紀江南築城，同防倭有關，奠定城市社會發展基礎，並從中見到地方社會力量的地位和作用。有人論明代南京城牆建築的人員構成。

市鎮研究頗有成果，重點在社會經濟和功能。

也有研究農村住宅的，吳建華論清代人口與住房，人口增加，擴建住宅，侵佔耕地及老宅基地的家族分配。

（八）災荒史與生態環境史研究

新近開展的研究領域，從事農業史的學者參與，但還沒有更多的學科參加。《中國農史》雜誌開闢「生態·農業·社會」專欄，發表生態環境與農村社會的論文；有關史料的彙編，如《明實錄類纂·自然災異卷》；專著孟昭華《中國災荒史記》，值得注意的是王利華《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》（2001），從人的食物變化、動物的消亡（鹿）

看生態環境的惡化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《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》，以自然災害個案為切入點，說明災害的過程與規律、災害與人口關係、災害中官方與地域社會的作用、災害與社會風俗。關於移民對生態的破壞，外來農作物對土壤結構的破壞，災害與信仰，荒政思想，賑災也有所論述。但是研究尚不深入，如一般性地講明代中葉鄂、陝、豫山區流民的破壞水土保持。

（九）身體史研究

作為國際學術界新興研究領域的身體史（醫療社會史），大陸學人的研究剛剛開始，在民間育嬰、種痘方面有論文。然而介紹西方研究的已有成套譯作——《閱讀身體系列》（2000），14種，有《身體與社會》、《西方文化中的女性身體》、《身體與情感》；“生理人文系列圖書”，2000年推出《乳房的歷史》、《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》等。研究方面值得介紹的是餘新忠的研究。撰著博士論文《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會》（預計2003、1），分析疫情特徵：時間上呈現遞增態勢；空間上集中在大城市為中心的人口稠密、社會經濟較發達地區；瘟疫種類以霍亂、傷寒、痢疾腸胃道傳染病為主，嘉道之際真性霍亂傳入，反映瘟疫國際化某種趨勢；傳播途徑以水傳播為主；殺傷力減弱；瘟疫影響人們的心態、風俗、信仰。瘟疫產生原因，天災是必然誘因，而人口是影響瘟疫分佈的關鍵因素。防治瘟疫，社會、政府有互動作用，社會力量與政府一致。新作〈從社會到生命——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、現實與可能〉，對身體史的研究史作出回顧，預言身體史的研究，或許會改寫人類歷史。

三、標誌性成果

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很多，作為標誌性成果，我想是周積明、宋德金主編的《中國社會史研究》（2000），其特點：

大架構的創新體例，分四編，即「社會史的理論與方法」；「中國社會史的基本問題」，含社會結構、人口與社會、宗族、家庭、生活方式、處世之道、鄉村社會、各種人群；「中國社會史的階段性問題研究」，斷代社會史研究；「中國社會史的個案研究」，以區域社會史在個案研究，瞭解不同地域、民族社會生活的差異。從學科的理論方法到內容的全面及具體的個案研究，含蓋面廣，反映社會史研究的較為完整的面貌。

最新社會史研究成果的總結。各個專題，皆由研究有素的學者寫作，多所創見，如陳春聲對神廟系統與社區演變關係，鄭振滿對於福建莆田家族企業，夏明方關於災害、環境與鄉村社會，周天遊的兩漢復仇，羅志田關於廢科舉與近代讀書人的邊緣化，等等方面的研究。

具有實用價值（如教材）。

四、社會史研究趨勢

（一）理論和方法的追求：專史說、整體史說、範式說、中層理論說的相繼提出。

專題史，以社會結構、社會生活及社會問題為研究物件，立足於專題研究，而面向整體史。

整體史，完整的歷史，陳旭麓：《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》，張靜如謂社會史是最高層級的歷史。

方法說，認為社會史沒有確定的研究物件，不能成為專史，只是觀察歷史的一種方法、視角（常宗虎）。

範式說，趙世瑜謂社會史一種史學範式，新史學基本上或者首先就是以社會史為表徵。

倡導中層理論說，楊念群謂：與本土語境相契合建築框架；在經濟史架構籠罩之外，尋求更微觀的單位詮釋基層社會文化，力求擺脫宏大敘事而不得當的研究積習，同時強調注意理論層次。（《中層理論——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》）

新理論將當今社會史理解為新社會史、新史學。

這些理論的提出，促進思考及學科建設，研究方法的更新，但具體研究難於實踐及實現，而個人有成果，如趙世瑜研究吏的歷史、廟會史。

（二）新領域的開拓

如生態環境史、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開啓，此外，民間社會、民間意識、城市史等領域的研究也有蓬勃開展之勢，特別是文化社會史研究的強勁勢頭令人認為，社會史的研究領域的擴充，可能會沿著下列歷程進行演變：

社會結構史（政治史的某種延伸及同社會學、經濟學的結合）、日常社會生活（社會現象）——意識、信仰（社會文化）——生態環境、身體醫療（關懷生命、社會問題）——（可能會向跨學科的整體史發展）。

這種演變，是社會史家力圖從社會現象的瞭解、描述向著社會本質認知的努力。

（三）學科研究結合的初步開展

社會史的產生，是史學家同社會學家、人類學家、經濟史家共同創造的，如今在沿著這種狀況走下去。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多有文學史家參與，法律社會史則借用法律學的成果，生態環境史、醫療社會史是跨學科研究，沒有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參與，根本不可能發展的更好，目前已有少數農學家、中醫學家參加研究。但這還不是深層次的合作，需要有計劃的聯合各個學科的專家，進行同一個項目的分工研究，現在還不具備這個條件，只有積極地等待。不過初步的合作應當盡量展開合作應當盡量開展。